



走出「典範移植」的困境： 論非西方國家的學者養成

黃光國*

1976年我自夏威夷大學獲得博士學位，返回台大任教後不久，即致力於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，不斷反省並思考國內科學研究落後的根本原因。1990年代之後，開始提倡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，從事本土心理學研究。近年來則竭心盡力，想將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傳授給年輕學者，因此，當國科會《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》邀請我替「學者養成」論壇撰稿，我立刻毫不猶疑地答應下來。

一、現代知識的哲學基礎

首先要談的是：這裡所謂的「學者」，是指西式教育體制下所培養出來的「學者」，而不是中國傳統書院所要培育的「學者」。這句話看起來似乎有點多餘，但在本文的論述脈絡裡，卻有特別強調的必要。更清楚地說，自從1898年七月四日，清光緒皇帝下詔成立「京師大學堂」，中國即正式開啓以西方學術作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教育；以台灣本地的情況來說，1928年四月，日本殖民政府設立台灣的第一所大學「台北帝國大學」，成為台灣現代化教育的肇始。前者為現今「北京大學」的前身；後者則為今日的「台灣大學」。從此以後，中國大學中所傳授的知識，已經不再是、或不純然是源自於中國文化傳統的知識，而是西方式的知識。

我要特別強調的是：西方式的現代知識是建構在其哲學的基礎之上的。這一點其實不難理解。我們到西方國家去留學，不管唸的是物理、化學、心理、地理，或是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教育，最後拿到的學位，都是哲學博士

*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

(Doctor of Philosophy, Ph. D.)。有些人可能會感到奇怪：我唸的又不是哲學，爲什麼給我一個「哲學博士」的頭銜？這是因爲：在西方的文化傳統裡，哲學是學術之母。學院中講求的知識，都是建立在其哲學的基礎之上。一個人既然已經拿到博士學位，他們就假設你一定懂得他們的哲學，所以頒給你「哲學博士」的頭銜。

問題是：西方國家視之爲理所當然的這種想法，對非西方國家的「學者」卻未必爲真。西方的哲學，其實就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成份，而且已經融入他們的語言之中。西方國家的一流大學，通常會把「知識論」(epistemology)和「專業倫理」(professional ethics)列爲通識教育(general education)的必須課程。在西方文化中成長的學者，對於西方哲學中的許多概念，若不是耳熟能詳，起碼也會有一定程度的理解。

然而，對於在非西方國家教育體系中成長的學者而言，西方哲學中的許多概念，卻是一種異質文化的產品。他們在受教育的過程中，對於這些概念如果沒有系統性的認識，就會在閱讀西文書籍的時候，看到諸如此類的相關字眼，可能會去查閱字典。遺憾的是：大多數人對這些概念通常也僅止於「字典式的理解」或「望文生義式的理解」。

二、「後續增補」的研究

儘管對科學的哲學只有「字典式的理解」或「望文生義式的理解」，大多數留學生只要跟從指導教授的研究典範，「依樣畫葫蘆」地刻意模仿，也能夠完成學位論文。可是，這種只講究「方法」而不注意「方法論」的研究方式，卻很可能使他們的研究工作喪失原創性，他們據此而寫成的論文，也很可能因此呈現出「後續增補」(follow up)的性格，陷入「典範移植」的困境。

在我看來，這是非西方國家科學落後的根本原因，也是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難以落實的理由所在。在像台灣這樣的非西方國家，今天我們要談「學者養成」，一定要設法使我們的年輕學者對於西方科學哲學的發展，能夠獲致一種「相應的理解」，作爲他以後從事學術工作的「背景視域」，能夠真正走出「典範移植」的困境。對於科學哲學的「相應理解」，可以說是非西方國家中的研究生進入學術這一行的必要條件，而非充份條件。更清楚地說，一個有志於以科學研究作爲終身志業的研究生，瞭解西方科學哲學的發展，並不保證他一定能成爲一個傑出的科學家；可是，如果他不瞭解西方科學哲學的發



展，無法掌握住西方人從事科學研究的那種精神意索（ethos），他大概就很難成爲一個有創造力的科學家。

三、哲學養成的困難

認識到這一點之後，我開始鼓勵研究生去修習科學哲學的課，並一再要求台大通識教育委員會設法開設這一方面的相關課程。不久，我就發現：即使如此，仍然不能解決我國年輕學者所面對的難題。其原因有三：第一，儘管國內許多大學的哲學系所也開設許多門課，介紹西方個別的哲學家及他們的哲學思想。然而，哲學系所開設的專門科目，卻很少是爲非哲學系所的研究生而設計的。他們不會討論：各種不同的哲學課程，跟社會科學的發展有什麼關聯；更少有人會去思考：如何以某種科學哲學作爲基礎，來從事社會科學研究。對於未來想要以學術研究作爲終生志業的研究生而言，他們不可能去修習許多門哲學課程；即使零零散散地修習了幾門哲學課程，對他們未來的研究工作，也未必有什麼幫助。

第二，從二十世紀以來，西方哲學中討論知識論的書籍可謂汗牛充棟。1980 年代之後，許多主要的科學哲學著作陸續被譯成中文，介紹西方主要思想家的書籍也大量湧現。然而，許多重要著作的譯筆十分生硬，讀來常常令人有一頭霧水之感；面對浩如瀚海而又不斷湧現的哲學著作，許多非哲學系所的研究生常常會有惶惶然不知如何下手的困惑。

第三，許多西方哲學家對於人生問題的關懷是多層面的，他們所思考的問題往往不僅只是知識論的問題而已，而且還包括倫理學、心理學、社會學等不同的層面。如果我們想要瞭解西方科學哲學思潮演變的來龍去脈，我們一定要從一個特定的立場切入，擷取他們的相關論點，來加以論述，而不能對每一位哲學家的思想作完整的介紹。如果一定要面面俱到地介紹每一位哲學家，不僅非作者能力所能及，而且單只一本書，恐怕也無法完成如此艱巨的任務。

四、《社會科學的理路》

基於這樣的考量，最後我決定自己「披掛上陣」，針對國內年輕學者的需要，撰寫一本《社會科學的理路》。我雖然不是出身自哲學專業，多年來推廣本土心理學的經驗，卻使我深刻瞭解國內的年輕學者需要些什麼。因此，這

本書分為兩大部分，前半部所討論的「科學哲學」，主要是側重於「自然科學的哲學」，尤其強調由「實證主義」到「後實證主義」的轉變；後半部則在論述「社會科學的哲學」，包括結構主義、詮釋學和批判理論。由於包括心理學在內的許多門社會學科，都同時兼俱「自然科學」和「社會科學」的雙重性格，一個年輕學者如果想要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上有所創發，非得要先瞭解這兩種「科學」的哲學基礎不可。

本書一共介紹二十世紀裡十七位最重要的哲學家。鑑於每一位哲學家的思想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，從事主體性思考所得到的結果，本書在介紹每一位哲學家的思想之前，都有一篇小傳，敘述他們主要的學術生涯，及其學術思想與其他思想家之間的關係。由於本書的目的是希望讀者瞭解西方科學哲學思潮的演變，因此，本書介紹每一位哲學家的時候，並不作全面性的介紹，而只側重於其思想中有關本體論、知識論和方法論的討論。

這本書在 2001 年出版之後，我開始用它當教科書，在台大開設「知識論與方法論」的課程。剛開始的時候，修課人數不多，通常只有一、二十人而已。近年來，認識到科學哲學之重要性的人愈來愈多，連附近大學的學生也來跨校修課，修課人數因而逐年上升。

五、詮釋學的循環

學生在唸《社會科學的理路》這本書時，我最常聽到的反應是：「奇怪！每一段中的每一句都看得懂，為什麼很多段加在一起，反倒看不懂？」

我的回應是：這是「詮釋學循環」的問題，也是「格式塔」心理學（Gestalt psychology）中，「部分」跟「整體」間關聯的問題。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，一個人一定要瞭解「整體」的文本之後，才能對文本的「部分」產生真正的理解。由於西方的科學哲學對我們是一種「異質文化的產品」，大多數年輕學者對它幾乎沒有概念，所以才會有這樣感覺。而且每一種哲學思想，都跟其他的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，課本中的章節根本無法盡言。因此，每學期開學之初，我都會特別警告學生：「不要翹課，有不懂的地方立刻發問。如果這樣做，還有不懂的，可以找我算賬。如果翹課不來，下次聽不懂，請不要怪我。」

從 2009 年開始，我應中正大學心理系之邀，為這門課開設遠距教學。我藉機要求台大計算機中心將我上課的情形做同步錄影，並掛在我的部落格



上。這樣任何對科學哲學有興趣的年輕學者，都可以打破時空的限制，隨時參與我對這門課的講授和討論。

六、邊陲國家的處境

中國人是一個非常重視「實用主義」，講究「學以致用」的民族。許多人在修這門課的時候，最為關切的問題是：如何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，從事學術研究？

我在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時候，一貫主張：在非西方國家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人，必須要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，掌握住西方人從事學術研究的精神意蘊，能夠對西方理論進行批判，同時又能建構適用於本土社會的理論，以之作為實徵研究的指引。

然而，很多搞本土心理學的人，並不同意我的這種主張。1993年，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講授科學哲學多年的蘇國勛教授，對我的主張很不以為然地指出：『科學研究綱領』主要是適用於近代自然科學，而不是用於社會科學，尤其不是用於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；它「是 Lakatos 作為科學史家以事後回顧的方式，對科學史上出現的和發生影響的各種學說和理論做出評價時所用的，不是科學工作者自身所用的，因此，『社會科學中國化』不應以『科學研究綱領』為謀。」完全否定了我的主張。

蘇教授的說法基本上是正確的。作為科學發展前鋒的西方核心國家，科學哲學確實是思想史家或哲學家針對「科學史上出現的和發生影響的各種學說和理論」做出反思和評價所得的結果，並不是「科學工作者自身所用的」。

然而，對於像台灣或中國大陸這樣非西方社會的邊陲國家，如果不瞭解西方科學哲學的精神，充其量只能套用西方國家發展出來的研究模式，蒐集一些零零碎碎的實徵研究資料，怎麼可能發展出「本土心理學」或「本土社會科學」？

七、具體的學術實踐

蘇教授是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講授科學哲學的權威學者，我要反駁他的論點，唯一的方法就是用我的主張，做出具體的研究成果，「拿證據來」。從此以後，「做出具體研究成果以說明自己的主張」，便成為我持之以恆的學術志業。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，我一方面持續研讀科學哲學的經典著作，另一

方面在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講授科學哲學。1995年我出版了《知識與行動》一書（黃光國，1995），用社會心理學的觀點，重新詮釋「道、儒、法、兵」一脈相承的中華文化傳統。後來又以將近十年的工夫，撰成《社會科學的理路》一書。這本書出版後第二年，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也在大陸發行簡體字版。2000年之後，我主持「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」，便以這樣的理念，指導研究生，從事實徵研究，陸陸續續在過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一系列論文。2009年，我整合以往相關的研究成果，出版《儒家關係主義：哲學反思、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》一書，並以之作爲「社會心理學理論」一門課的教材，教導學生如何批判西方的社會心理學理論。

從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來看，目前西方心理學者所建構出來的理論，絕大多數都是建立在「個人主義」的預設之上。然而，東亞儒家社會的文化傳統卻不是「個人主義」，而是「關係主義」的。基於這樣的前提，我們不僅可以批判西方社會心理學既有的理論，而且可以建構出自己的理論，在本土社會中從事實徵研究。

理論是觀看世界的眼鏡，有好的理論，才可能有好的實踐。在觀察本土社會問題的時候，戴上適當的理論眼鏡，我們可以看清楚自己所處的外在世界，並且找出解決社會問題的具體方法。相反的，如果我們戴的是西方理論的眼鏡，往往會因度數不夠精準，而像是在霧裡看花，看不清問題的關鍵所在，對於社會問題的處理，更可能治絲益棼，愈搞愈亂。在像台灣這樣的非西方社會裡，「學者養成」最重要的任務，就是要教導年輕學者認識西方文明之優長，讓他們懂得據之建構適切的本土社會科學理論，來解決自己在生活世界中所遭逢的各項問題。有志之士，盍興乎來！

參考文獻

- 黃光國（1995）：《知識與行動：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詮釋》。台北：心理出版社。
黃光國（2001）：《社會科學的理路》。台北：心理出版社。
黃光國（2009）：《儒家關係主義：哲學反思、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》。台北：心理出版社。